

社会应急治理共同体的生成进路与特征缕析

——基于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考察

张其伟

(上海交通大学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上海 200030)

摘要:社会应急治理共同体是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各阶段,为满足应急响应、医疗救助、民生保障等多元需求,在城市当中由社会力量主导产生的结构性个体联结。基于“联结方式—资源条件—制度关联”三要素分析框架,探讨社会应急治理共同体的生成进路和共性特征。考察不同类型社会应急治理共同体发现,此类共同体内部联结依托突发事件在短时间内产生,借助互联网工具建立互动渠道;共同体形成的主要驱动力是作为元主体的社会组织同时具备情感价值和工具价值;此类共同体得到党政部门和社会成员双重赋权而获取二元合法性。社会组织在共同体生成过程扮演驱动者、吸纳者与协调者等不同角色。

关键词:应急治理;共同体;情感价值;双重赋权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292(2023)03-0151-08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自2008年汶川地震以来,社会力量在应急治理领域开始承担主体角色,协同参与应急救援和灾后重建等工作。近年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从社区防控到款物募集,从助力民生保障到推动复工复产,社会力量在不同阶段都发挥了突出作用^[1]。对于突发事件社会力量参与机制的诸多解释中,共同体作为一个时兴概念被一再提及。已有学者指出,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关键是建构有效的风险共同体^[2]。城乡基层社会之所以能在公共卫生事件中有巨大张力和韧性,离不开各行动单元的共同体性质和中国社会整体从“家”到

“国”的共同体嵌套结构^[3]。还有学者总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催生了四个层面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即自救志愿者网络建设、小区共同体建设、跨地域公益服务共同体建设和调配慈善资源的慈善共同体建设^[4]。这些研究为突发事件中的共同体建设路径提供了一系列的诠释思路。

然而,在一个普遍被认知为单向度人组成的“陌生人社会”^[5],大量处在自由且孤单状态的个体如何能够被动员到突发事件应对与处置机制中?前期的经验观察发现社会组织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西方学者的研究认为,社会组织能在合作网络中帮助其他参与主体实现信息共享、灾害预

作者简介:张其伟,男,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组织与应急管理。

防、应急响应和恢复方面的全流程合作^[6],还能通过影响志愿者有效拓展一国的民间社会网络^[7]。国内学者指出,社会组织在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治理中具有提供专业技术支撑、搭建信息沟通平台、动员与整合社会资源、供给多样化服务产品以及提供政策规划或决策咨询的功能^[8]。社会组织可通过构筑社区互助网络,促进社区共同体的形成^[9]。本文试图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切入,跳脱社区的地域限制,对社会应急治理共同体的生成和维系机制加以解读。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基于何种进路,社会组织主导构建的社会应急治理共同体能够形成?不同类型的共同体又有哪些共通特征?

二、分析框架

本文所定义的社会应急治理共同体,是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各阶段,为满足应急响应、医疗救助、民生保障等多元需求,在城市当中由社会力量主导产生的结构性个体联结。此类共同体的成员包括社会组织、其他社会力量和民众个体,党政部门也有限度地参与其中。强调“社会”是为了将此种共同体与党政体系所主导的应急治理共同体进行区分,凸显其民间性,以明确研究对象范围。基于此概念,本研究构建了相应分析框架,明晰社会应急治理共同体的生成和维系机制。

(一) 共同体成员的联结形式

要对社会应急治理共同体的生成进路进行探究,首先需要明确共同体成员以何种方式产生聚合,即成员的联结形式。现实中的共同体通常是由多重因素叠加形成。为了使概念阐释更具有操作性,本研究关注的联结形式主要是社会组织使成员加入相应共同体当中的特殊纽带。

共同体研究中,为个体建立联结的纽带是重要的研究对象,如地缘、情感、利益关系等。林南的“资源观”强调纽带联系对于信息资源和人情资源的动员作用,作为嵌入社会网络的资源供行为人在采取行为时使用^[10]⁵⁹。纽带有时以符号的形式出现,代表共同体成员所捍卫的共同价值或分享的共同记忆^[11];有时是基于学缘、业缘或个人关系而产生情感关系^[12];有时则是能提升个体行动有效性的互惠关系^[13]。共同体成员被何种形式的纽带牵引到应急场域内,是本研究关心的第一个

维度。尤其考虑到在类似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物理的区隔让直接的人际交往变得相对困难,个体依托怎样的平台载体产生交互,更值得探究。

(二) 社会组织可支配的资源条件

共同体概念自诞生之日起就与资源存在密切相关。在欧洲的传统乡村共同体中,掌握在集体手中的各类资源成为约束或激励个体行为的重要工具。本文所要研究的资源条件,包括成员可投入抗疫的物质资源,以及个体和集体所掌握的社会资本。

在我国共同体研究中,论者更多从信任、认同、关系等角度论述共同体的形成条件,对于资源的关注度较为有限,物质资源对于共同体生成和延续的重要性没有获得足够重视。实际上,经典资源依赖理论早已指出,组织为了生存需要获取环境中的资源,并由此与所在环境产生互动乃至依存^[14]²⁵⁸。共同体作为人类社会中一种基础化的组织,其存续同样与自身掌握的资源情况有关,且资源条件的不同会显著影响共同体的运作方式、成员间关系以及功能实现程度。本文所关注的物质资源包含共同体及其成员所掌握的资金、物资、人力等资源。

(三) 共同体与国家权力主体的制度关联

制度主义视角下,共同体可以被公共和私有制度所形塑,成为一个政治过程,国家在其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15]。这种国家嵌入社会的情况在应急情境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国家领导人对于基层防控体系的指导与肯定,以及各类资源在国家的统一组织下向基层下沉,都是国家与社会直接互动的形式。因此,共同体与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也成为本研究的关注视野之一。

理想状态下,社会组织在应急治理体系中可以暂时承担“元治理者”的角色^[16]。但在原本政府占据主导的治理体系中,社会组织如何获取担任元治理者的合法性,并利用此种地位演变为应急治理共同体中的“元主体”,成为值得探索的研究议题。社会组织通过何种方式构建特定场域内的应急治理框架,这一框架是否具备合法性,并如何向国家反馈治理效果,同样为本研究所关注。

综上,本研究构建了“联结方式—资源条件—

制度关联”三要素分析框架,探讨社会应急治理共同体的生成进路和共性特征。联结方式作为内生要素,探讨的是社会组织聚合社会成员、作为社会枢纽的过程;资源条件作为禀赋要素,探讨的是社

会组织创设资源环境、成为资源平台的方式;制度关联作为外部要素,探讨的是社会组织适应制度环境、化身元治理者的方略。本研究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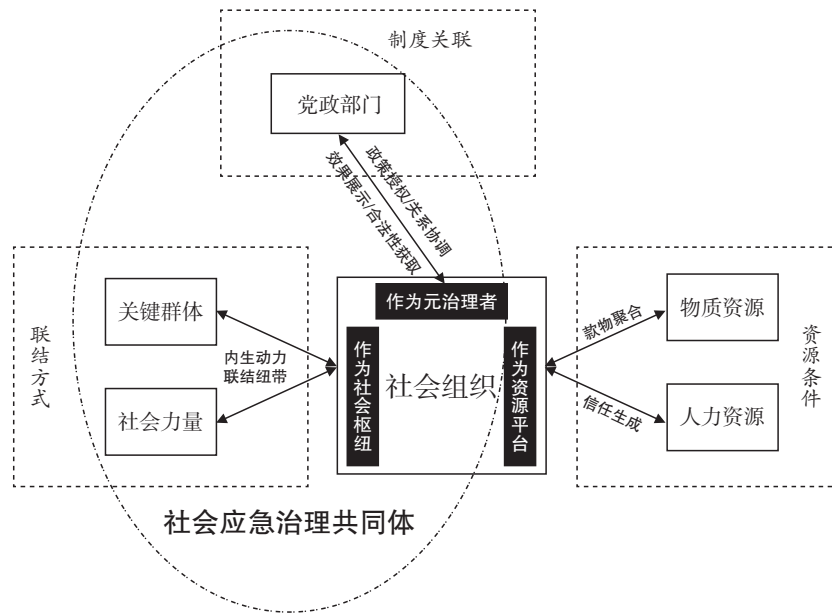


图1 社会应急治理共同体生成进路分析框架

三、社会应急治理共同体的多案例比较

本文将对不同类型社会组织主导的社会应急治理共同体进行个案比较,描摹梳理三种典型模式。依据社会组织性质不同,本文选取一家正式登记的公益性社会组织(H省慈善总会),一家正式登记的互益性社会组织(W大学校友总会)和一家首先以志愿自组织团队身份开展活动、后登记为社会服务机构的组织(XL团队)作为样本,遵循案例选择的“最大差异法”原则,观察这些组织所主导的共同体生成进路。笔者从2020年至2022年持续对三家组织的行动进行观测,对核心成员开展访谈,并曾作为志愿者在2020年参与到H省慈善总会的应急行动中,积累了丰富的原始资料。

(一)公益性社会组织主导的社会应急治理共同体生成进路

公益性社会组织的代表是H省慈善总会。在地方,慈善会形态的公益性社会组织能发挥整合资源的功能^[17]。作为全省的枢纽型慈善组织,H省慈善总会承担起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款物募集

和发放任务,成为网罗不同款物资源和志愿者力量的节点组织,成功接收来自全球270多万人次超过61亿元的爱心捐赠,接收并发放捐赠物资1亿多件。

H省慈善总会主导的共同体具有显著的目标导向特征。参与到H省慈善总会应急治理实践中的主体既有原本就是协会会员和合作者的个人和组织,也有之前并无任何交集的机构。在“为H省和W市更快更多提供防疫物资”这一共同目标的指引下,各类个人与组织开展集体行动,产生共通的使命认同。H省慈善总会在疫情期间与各类组织建立起稳定而有效的伙伴关系。在横向上,H省慈善总会能协调不同相关方,建立了几乎是H省内最大的全天候应急志愿者队伍;在纵向上,该组织发挥慈善会体系的优势,进行垂直资源的动员。

联结方式上,H省慈善总会依托建立不同工作小组的方式来实现内外部的有机联结,突破常规架构而实现更具针对性的模块化临时工作机制。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H省慈善总会启动

防控专项募捐工作机制,将工作人员和来自不同单位的1003名志愿者按照物资接收、仓储运输、物资分发、捐赠热线接听、清关协调等工作职能进行分组,每组建立相应微信群,群内既包括总会的全天候志愿者,也根据功能不同包含捐赠方、接收方或者运输方、海关等单位的人员。这一机制使所有参与人员在动态形势下能够较为迅速地进入角色,实现模块化任务分配。H省慈善总会还根据社会需求的变化,动态调整相应分组和人员安排,基本保证在特定时期的重点工作能够匹配相应的人力资源,为专项募捐的顺利完成奠定基础。

资源条件层面,H省慈善总会具备几乎所有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的社会组织中最为优越的资源条件。该协会是民政部门乃至整个政府系统在突发事件中对接社会资源的主要抓手。他们早期就接受民政部门安排,统一协调省内慈善组织的款物捐赠接收工作。在民政等部门的协调下,H省慈善总会获得多种来源的志愿者资源,包括专业救援队人员、高校学生、医药集团员工、专业社工,甚至还有近100名H省民政系统工作人员投入其中。

制度关联方面,H省慈善总会与党政部门主导的公共卫生事件防控行政体系具有高度关联性,完全被纳入该省的防控整体布局中。H省省级指挥部的分组包括社会捐赠组;省民政厅募捐工作专班搭建的四个联络组当中,有一个专门对接H省慈善总会;H省民政厅厅长直接与慈善总会秘书长建立联系,在志愿者资源协调方面提供帮助。另外,该慈善总会与海关、税务、公安、审计等政府部门实现互动合作,成为政社协同开展应急治理的枢纽平台。

(二)互益性社会组织主导的社会应急治理共同体生成进路

W大学校友总会是突发事件中的互益性社会组织代表。校友会类组织依学缘建立起来,是单位之外的社会结合方式^[18]。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W大学校友总会为代表的互益性社会组织在资源募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根据其自行统计,所有校友捐赠人数逾40万人次,捐赠总额超过12亿元人民币,占所在城市接受捐赠总额的1/4。

W大学校友总会主导的共同体具有鲜明的身

份认同特征。社会群体认同原本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当个体作为不确定“认同环”上的一分子,且该认同环呈现强势时,个体就会倾向于依附此认同环,而暂时掩盖其他的认同属性^[19]。“W大学校友”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成了一个具有高度认同度的共有身份,募捐动员信息通过“LG山”、“樱花”等与W大学关联度极高且校友耳熟能详的标志性符号在校友之间迅速传播,提升了共同体身份的感召力,形成40万人次的参与规模。

联结方式上,这一共同体高度依赖自媒体所构筑的社交网络。由于W大学校友遍布全球各地,大部分人的参与需要基于互联网,而网络群体性行为很大程度上需要群体成员在领会自身公共角色之后,通过其表达建构“话语信任来推动行为实现”^[20]。W大学校友总会基于两个方面建构话语信任。一方面,数个校友微信群交叉式广覆盖,一定程度上消除集体动员过程中的地理区隔,即使平时互不认识也较少关注W市动态的校友也能够获取低成本的互动空间,营造出现场感。另一方面,各地校友会持续性地开展信息公开,如W大学纽约校友会每天更新当天的捐赠信息,附上详细物资清单及去向表,并安排专人解答各位校友捐赠人的疑问。作为共同体的W大学校友总会,在这样的双重机制作用下提升成员认同,并由此驱动集体行动。

资源条件层面,W大学校友总会在应急状态下动员到遍及世界各个角落、活跃在不同行业的校友,并由此产生惊人的资源聚合能力。用相关研究中的描述来说,“它几乎可以做任何事”^[21]。依托50多万名会员以及其拥有的人、财、物、信息等资源,W大学校友总会可以为抗疫提供从中心到外围、从紧急救援到复工复产再到常态化防控的各类公共产品及服务。这也使得抗疫过程中该共同体的存续时间长于其他组织——作为功能性共同体,它能在任何阶段找到发挥作用的具体事务,在资源整合方面呈现空前的脱域性。一批日常不在W市工作生活,但作为校友的国内顶尖企业家加入其中,使该校友会具备了极强的资源动员能力。

制度关联方面,受益于当地对校友经济的重视和组织领导人的个人关系网络,W大学校友总

会建立了与党政部门的密切联系。2017年,W市启动“百万校友资智工程”,尝试打通高校、校友和城市三者间关系,将校友招商作为地方招商引资的新突破口。自此,包括W大学校友总会在内的各家校友组织开始深度嵌入当地的经济活动中,并建立了与地方政府较为密切的互动机制。以W大学校友企业家联谊会会长SD为代表的知名企业家长期积极参与校友活动,帮助W大学校友总会进一步建立密切的政商关系。SD会长的公司等多家W大学校友企业作为协办单位,支持W市政府主办的“世界大健康博览会”,并由此和卫健系统建立密切联系。正是这次合作使他们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初期能够迅速获取信息并展开行动。

(三) 志愿自组织主导的社会应急治理共同体

XL团队是参与应急治理的志愿自组织代表。自组织大多由民间志愿者个体发起,具有产生自发性、运作自主性和行为自觉性特点^[22]。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不同类型自组织广泛吸纳社会力量并服务抗疫目标,成为初期重要的社会响应者^[23]。XL团队早期开展医护出行服务,后期专注医疗资源链接,共对接超过70个企业和机构,通过相关部门向H省内260家医院完成了200余笔捐赠工作。2021年5月,在W市C区共青团区委主导下,原本作为自组织的XL团队登记为社会服务机构。

XL团队主导的共同体具有明显的情感导向特征。该团队在2019年以前只是一个全职妈妈分享生活的内部组织,成员仅20多人,但在疫情最紧急时刻,一度发展到300余人,并最终登记为正式社会组织。该组织成员从素不相识的个体,经过应急状态下的焦虑型团结走到一起,形成较为稳定的网络团队。

联结方式上,XL团队能够聚合并扩展规模,是因为激发了面临共同焦虑的人们临危互助的共同体意识。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指出,在风险来临时,共同的焦虑取代共同需求,形成一种新的触发动力的力量^{[24]48}。XL团队最初的形成,也来自公共卫生事件中成员对家庭安全的担心。该团队很早就开始帮助成员所在社区采购紫外线消毒仪等设备,随着需求的不断增大,希望加入团队

的人越来越多,大家在焦虑中生成“抱团取暖”的需求,并由此衍生出具有利他倾向的集体行动。团队主要依托微信群进行联络,一些成员直到形势稳定前都未曾见过面,但在网络世界中已经是可以深聊的好友。

资源条件层面,XL团队的资源基础十分有限。尽管已经是一只运作较长时间的互益性团队,但成员中并没有经济实力过硬,能够规模化购买防疫物资的个体,成员自身的物资储备也普遍不充裕,难以适应长期的线下作业。经过权衡,发起人YL决定依托自己曾担任地产公司销售经理,具备较强沟通能力和一定人际网络的优势,承担起对接H省医院和外地潜在捐赠者需求匹配服务的工作。这种转化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从依托物质资源转向依托社会资本而开展服务。经由YL等骨干志愿者的朋友圈,自组织逐步被扩展到更大范围内的弱关系网络,并产生了实质性的资源对接效果。

制度关联方面,XL团队成员中虽然也包括国家企事业单位从业者,但并未与中央或地方政府领导建立互动机制,导致他们对政策动向的反映较为滞后,并面临行动“踩红线”的可能。为规避风险,XL团队与H省慈善总会沟通,拟以整支志愿者团队的形式加入该协会作为海外督查组成员负责海外捐赠的联络和督办。适逢H省慈善总会人手短缺,无法应付捐赠而来的巨量物资,很快就同意了XL组织的加入。2020年下半年,XL团队与H省慈善总会达成一致,在慈善总会设立专项基金,方便开展联合募捐、信息公开等事项。

四、社会应急治理共同体的共性特征

通过对上述三类社会组织主导的共同体案例研究可以发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所生成的社会应急治理共同体具有不同于以往共同体的特点。首先,无论成员的过往互动基础如何,社会应急治理共同体内部联结依托在短时间内产生,受到空间区隔的影响,这类共同体通常依托互联网工具建立沟通渠道,联结方式呈现较强的技术赋能属性。其次,这些共同体形成的主要驱动力在于元主体同时具备情感价值和工具价值,即主导社会组织既能够承载成员的身份认同需求,又掌握解决应急问题所需资源。最后,这些共同体一

方面与党政部门建立有机联系,在行政层面获取合法性;另一方面得到社会成员的认可,在民间层面获取在地合法性。二元主体双重赋权使组织产生了共同体效力。

(一)危机催化与技术赋能:共通性的联结方式

三类应急治理共同体在形成过程中都出现了社会组织成员或共同行动参与者关系逐步密切、互动更加频繁有序以及彼此认同度增强的情况。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定共同体内部依托危机而产生了合作性和身份认同,进而通过互动开展集体行动,从而改变突发事件中整个社群的境况。持续不断的舆论宣传加强了此种认同意识:大部分个体长时间待在家中,闲暇时间需要依赖刷手机度过。诸多爱心人士奋不顾身开展服务的事迹被传统媒体和自媒体报道后,个体开展利他行为的意愿有所提升,为社会组织启动公益性活动创造了条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受限于空间被阻隔的现实,线下的面对面沟通难以实现,大部分群体之间的交流必须通过互联网实现,这让共同体的形成同时具备技术驱动和技术依赖的特征。在技术工具的推动下,社会组织与相关方的边界越来越模糊,满足众多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促进双边或多边行为主体的交互作用,逐步演化成复杂的生态系统^[25]。共同体成员在此系统中实现彼此之间的沟通,并依托技术资源拓展共同体的边界。案例中,H省慈善协会通过建立在线群组,依托即时通信工具和线上协作工具实现与志愿者和合作伙伴的互动同步;W大学校友总会数个校友微信群交叉式覆盖,有效消除了集体动员过程中的地理区隔,为平时根本不相识的校友及各地校友会提供了低成本的互动空间;XL团队的微信群不仅为散居各地的志愿者提供资源对接渠道,还成为个体宣泄情绪的舞台,宣泄过程同时作为共同话语建构过程,强化了个体之间的情感联结。

(二)情感价值与工具价值:共同体的普遍意义

情感价值,尤其是对于集体身份认同的需求构成了社会应急治理共同体形成的重要动力机制。突发事件初期曾出现“地域歧视”的问题,社

交媒体中对于W市居民的污名化时有发生,并因此产生了一系列网络言语暴力乃至线下的行为暴力,引发浅层的社会冲突。此种情况下,作为被污名化对象的W市居民,更容易在冲突中产生团结意识,通过参与社会组织主导的志愿服务来捍卫家园,并经由组织成员身份产生更强的集体身份认同。

同时,社会应急治理共同体形成过程中,工具价值产生的作用并不弱于情感价值:公益性社会组织在特殊情境下款物接收职能的独占性是促成成员间联系生成的关键变量;互益性社会组织尽管依托学缘积累了一定的存量社会资本,但在突发事件中真正将全球范围内校友动员起来的力量还仰赖其“解决问题”的能力;志愿自组织在弱关系基础上能够一直存续,是因为核心成员展现出链接社会资源、提供应急服务的能力,赢得了其他成员的信任。

(三)国家与社会的双重赋权:共同体的二元合法性

所谓双重赋权,是指三大类型共同体的元主体都实现了与国家、社会的有机联结。一方面,他们通过不同方式与行政体系产生关联,在应急状态下获得行动合法性;另一方面,他们得到自己的目标动员群体支持,能够驱动一部分社会力量投入抗疫的各项服务中,并在此过程中完成价值形塑。H省慈善总会呈现典型的“双重身份”特征,不仅能够适应政府和社会两套话语体系,还为其衔接两方面资源创造条件,在保证独立自主开展募捐项目的基础上,通过行政体系支持,保障款物捐赠收发的高效。W大学校友总会与政府部门尤其是卫健系统的密切联系,使其提早获取重要信息展开行动布局,实时回应党政部门诉求并有针对性地开展政策倡导,全世界范围内的校友支持使物资募集过程保持畅通。XL组织原有的政府联结较为薄弱,但同样寻找到W市C区共青团区委这样的指导单位,在和外部沟通时提供合法性背书。在社会端方面,XL组织则利用前期与其他自组织的广泛联结,不断吸纳骨干成员,提升社会认同,最终完成从草根团队到正式组织的演进。

这样的双向联结格局,使各类社会组织都获得来自国家与社会的双重赋权。作为社会团体相

关研究中的重要概念^[26],双重赋权过往指代的是国家与社会互相嵌入并共同提升权力的过程。本研究归纳的双重赋权则是将社会组织从社会整体中抽离出来,作为承担协调、协同与协作职能的元治理者,接受来自政府和社会两个层面的权力转移。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造成的不确定环境中,社会组织的灵活性与专业性需要受到来自国家与社会的充分认同,获取二元合法性。

需要说明的是,不同类型的共同体具有的差异性特征同样较为明显。由于缘起方式的差异性,并非所有共同体一开始就有良好的情感纽带联结基础,而是在危机当中不断演化生成纽带。由于元主体的规模不同,这些共同体掌握的资源也存在较大差异,规模化与“小而美”并存。另外,由于党政部门嵌入程度的不同,各家社会组织的自主状态不尽类似,也直接影响共同体的行动独立性。

五、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三类社会应急治理共同体生成进路的解析,归纳总结不同类型共同体的共性特征,本研究认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社会应急治理共同体建构过程存在如下共通模式: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社会组织为主导,以精英个体为骨干,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共同体在强烈的社会需求中诞生,有效满足各单位和个体对于医疗防护物资及生活物资的期待。在保障社会个体生命健康安全的共识之下,组织成员基于身份认同,积淀出共同情感深化纽带联结,社会组织在其中扮演驱动者、吸纳者与协调者等不同角色。

应急状态下活跃的社会组织的内部联结方式、资源环境和制度关联状态都存在较大分野,其中资源环境差异性最大,表现为从可以调动几十亿元款物的头部机构到只能承担有限物资对接工作的微型自组织。虽然差异存在,但不同状态的社会组织都能在一定场域范围内建立起共同体,表明个体能力层面的悬殊差距虽客观存在,但我国基层社会仍然潜藏着珍贵的人际信任和集体团结。在危机来临时,这些要素足以驱动社会公众参与到应急响应过程中。

党的二十大报告再度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一时代命

题,将加强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和应急能力建设作为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面向。然而在社会转型、异质性与流动性成为主流特征的城市^[27],共同体建设的目标面临严峻挑战,社会整体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的应急能力也有待提升。社会组织作为元主体搭建的共同体具有强烈的应急色彩,有助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社会自主防控救治,且对于常态下形成跳脱于居住社区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具有参考价值。在当前的社会治理体系安排中,社会公众参与活力难以激发,影响着治理共同体的形成以及治理效能的提升。在提升社会公众集体身份认同载体功能和工具价值的前提下,社会组织或可成为破解治理困局、打造多元共治或协同治理新格局的主要力量。

参考文献:

- [1]徐家良.疫情防控中社会组织的优势与作用:以北京市社会组织为例[J].人民论坛,2020(23).
- [2]王俊秀,周迎楠,刘晓柳.信息、信任与信心:风险共同体的建构机制[J].社会学研究,2020(4).
- [3]赖金良.“中国奇迹”背后的中国社会[J].浙江社会科学,2020(10).
- [4]朱健刚.疫情催生韧性的社会治理共同体[J].探索与争鸣,2020(4).
- [5]常海波,李伟.陌生人社会与雷锋精神[J].宁夏社会科学,2016(4).
- [6]CARUSON K, MACMANUS S A. Disaster vulnerabilities: how strong a push toward regionalism and intergovernmental cooperation [J]. The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08(3).
- [7]DAIMON H. & ATSUMI T. “Pay it forward” and altruistic responses to disasters in Japan: latent class analysis of support following the 2011 Tohoku Earthquake[J]. Voluntas, 2018(1).
- [8]董幼鸿.社会组织参与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的困境与优化路径:以上海联合减灾与应急管理促进中心为例[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
- [9]朱健刚,邓红丽,严国威.构建社区共同体:社会组织参与社区防控的路径探讨[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
- [10]林南.社会资本[M].张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 [11]李爱龙.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确证[J].宁

夏社会科学,2022(2).

[12] 赵文聘, 万志彬. 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形成逻辑和策略: 以P市D街道为例[J]. 中国社会组织研究, 2021(2).

[13] PUTNAM R D. Tuning in, tuning out: the strange disappearance of social capital in America[J].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1995(4).

[14] PFEFFER J, SALANCIK G. The external control of organizations: a 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 [M].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8.

[15] 程秀英, 孙柏瑛. 社会资本视角下社区治理中的制度设计再思考[J]. 中国行政管理, 2017(4).

[16] DERKX B, GLASBERGEN P. Elaborating global private meta-governance: an inventory in the realm of voluntary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14(1).

[17] 卢素文, 艾斌. 资源依赖与精英权威: 农村社会组织与基层政府的双向依赖和监督[J]. 中国农村观察, 2021(4).

[18] 马强, 高丙中. 校友会组织: 单位之外的社会结合[J]. 西北民族研究, 2017(4).

[19] 陶庆. 旋转的“认同环”: “福街商会”的象征与仪

式[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0(8).

[20] 张杰. 话语信任与网络群体建构: 社会化媒体的信任机制研究[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3(8).

[21] 罗志敏, 陈春莲. 大学校友组织: 公共性建构与组织成长: 以武汉大学校友抗疫应急救援行动为例[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1(3).

[22] 聂磊. 自组织集体行动的个人动机、意义建构与整合机制: 以草根志愿组织为例[J]. 兰州学刊, 2010(7).

[23] ZHAO T, XU J, TIAN Y, et al. Self-organization's responses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China[J].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22(2).

[24] 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 新的现代性之路[M]. 张文杰, 何博闻,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8.

[25] 范如国. 平台技术赋能、公共博弈与复杂适应性治理[J]. 中国社会科学, 2021(12).

[26] 徐家良, 季曦. 社会组织自主性与政府形塑: 基于行业协会商会改革的政社关系阐释[J]. 学习与实践, 2022(4).

[27] 徐林, 许鹿, 薛圣凡. 殊途同归: 异质资源禀赋下的社区社会组织发展路径[J]. 公共管理学报, 2015(4).

Formation Approach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Emergency Governance Community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Zhang Qiwe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Abstract: The social emergency governance community is a structural individual connection led by social forces in cities in order to meet multiple needs such as emergency response, medical assistance and livelihood security at various stages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Based on the three-element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connection mode-resource conditions-institutional ti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formation approach and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cial emergency governance community. Through examining various communities led by different types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t is found that the internal connections of such communities are generated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due to disasters, and interactive channels are established with the help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main driving force for the formation of communities is that social organizations, as meta-subjects, have both emotional value and instrumental value. This kind of community is empowered by the authorities as well as social members to obtain dual legitimacy. Social organizations play roles such as drivers, absorbers and coordinators in the process of community formation.

Keywords: emergency governance; community; emotional value; dual empowerment

(责任编辑 薛雯乔)